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
出版规划项目



东征·西征

任文 主编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
出版规划项目

东征·西征

任文 主编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

图书代号 SK14N058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征·西征 / 任文主编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
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4. 6
(红色延安口述·历史)
ISBN 978 - 7 - 5613 - 7086 - 5

I. ①东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红军东征(1936)—
史料 ②红军西征(1936)—史料 IV. ①E29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76463 号

东征·西征

任 文 主 编

责任编辑 王丽敏
责任校对 高 歌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 www.snupg.com
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 × 1020mm 1/16
印 张 21.25
插 页 2
字 数 270 千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13 - 7086 - 5
定 价 39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电话:(029)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(029)85303879

“红色延安口述·历史”

编辑委员会

总策划	冯晓立	傅功振		
主 编	任 文			
编 委	薛义忠	石 杰	梁向阳	孙国林
	朱鸿召	张军锋	梁星亮	姬乃军
	刘卫平	田 刚	陈答才	王晓荣
	刘东风	冯晓立	傅功振	
参编人员	王 耀	王晓飞	王慧子	邓 微
	仝 蕾	巩亚男	庄婧卿	刘存龙
	张 双	赵虹波	雷亚妮	

编辑说明

“红色延安口述·历史”是一套以口述实录、回忆录、访谈录以及相关原始档案并配以历史图片为基本内容的史料集成。它试图以亲历者、当事人、知情者或者后代的讲述、回忆，来还原历史真相，呈现延安十三年的辉煌，从而改善当代人对“符号化”延安的僵化认识，再现一个本色、真实的延安。入选文章均来自已出版的图书、杂志、报纸，酌量选录地方党史办公室、政协文史机构等征研的资料。

丛书所选文章注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，尤重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梳理。丛书内容虽以回忆、口述等形式呈现，但其较强的故事性、可读性，有益于对当代读者，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，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意义。

丛书共17种21册。内容包括口述实录、回忆录、访谈录、重要的档案材料及代表性研究文章。口述实录、访谈录与回忆录前均设置了对口述人或回忆人的简要介绍，并突出介绍口述人或回忆人在延安的工作或生活经历。

所选文章中，因个人当时的见闻条件、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失真以及可能附加的主观因素等，讲述人或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，且不同的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细节叙述也常稍有出入，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复杂

性、多元性，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应该是“人的历史”，不能只有一种“写法”或“说法”，更不存在“唯一性”，这样才能更趋历史“真相”。为尊重原作，编者收入时未强求统一，多以“编者注”提醒读者注意。

入选文章写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30年代到本世纪初，每篇文章自有其文字风格和时代的语言习惯，收入本丛书时，除特殊情况外，皆尊重原文，不做改动；原书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术语）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，多未做改动。如确系作者笔误、排印错误、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，则予以修正。标点符号、数字用法等，依据现有出版规范做了统一处理。除特殊情况外，原文篇后注或行文注统一移作脚注，文献著录稍加统一。

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足，或翻检资料有限，或水平、认识有限，其中可能存在讹误或差错，敬请方家、读者批评指正。

作为一套大型汇编丛书，涉及文字与图片等著作权联系方面的工作难度很大，我们进行了多方努力和联系，但仍有部分作者信息不明或原工作、生活地址变动而无法联系，希望版权人或版权继承人见书后与我们联系，以奉稿酬与样书。

谨以“红色延安口述·历史”的出版，向革命先辈致敬！

“红色延安口述·历史”编委会

2014年3月

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红军东征(代前言一)

耿仲琳 田逢禄 唐 群

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，毛泽东做出了红一方面军东征的战略决策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。红军进行的东征战役，表明我党我军决心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联系起来，紧急动员全国民众，猛烈发展革命力量，积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在发展中求巩固，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。

一、红军东征的缘起

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胜利到达陕甘苏区，终于找到了一块落脚点。但是，这块根据地作为新的革命大本营还太小、太穷，也不够巩固，仍然面临被“围剿”的严峻局面。11月30日，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号召：“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，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。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，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。”在这个报告中已经蕴含着去山西的思想。当天晚上，在给张闻天的电报里，他明确地提出东讨阎锡山的思想。电报说：“目前不宜即向宁夏，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。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。”第二天，他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、周恩来：“如阎军渡河西向，我军开进决迎击并准备乘胜渡河东向。”

当时，关于战略攻击方向的选择，有三种意见：毛泽东主张向东，张闻天主张向北，彭德怀主张向南。张闻天11月20日及2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：红军主力应迅即向北进攻宁夏，夺取绥远五原、包头地区，接近外蒙，打通苏联，取得国际援助。毛泽东12月1日复电张闻天：“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

针，我是完全同意的。”“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。第一，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。在四个月内，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，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。第二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。这是用战争、用发展、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。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，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。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，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。”彭德怀认为，以现有力量进攻宁夏及五原、包头，是不可能的，有极大的危险性。他建议目前战略方针应以发展关中游击战争，巩固南线为中心。他同意红军突入山西，目的是调动陕北晋军回援，在运动中歼灭晋军，扩大红军，求得在黄河一段巩固发展。林彪也曾提出要到陕南打游击。

毛泽东坚持选择山西为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向，是根据全国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，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做出的决断。在他看来，东征将会带来很大的战略利益。

（一）日本帝国主义在1935年制造“华北事变”，加紧对中国侵略的步伐。蒋介石继续执行卖国政策，阎锡山的亲日反共立场十分嚣张。在抗日爱国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，红军东征山西，打击汉奸亲日派阎锡山的气焰，宣传我党我军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，声援北平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，用实际行动号召和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，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。山西、绥远地处抗日前沿，如果红军在山西站住脚跟，便于开赴前线直接对日作战；出山西、绥远，还可接近外蒙，便于打通苏联取得援助。

（二）东征山西，可以在阎锡山统治区域扩大红军，补充给养，筹措款粮，征集物资。这样，以主力红军冲破黄河防线到外线作战。一方面，可以减轻对陕北苏区经济上、兵源上的压力；另一方面，有可能在山西创建新的根据地。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“用战争、用发展、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”，即“以发展求巩固”的方针。

（三）红军东征有利于对张学良、杨虎城等的统战工作。红军选择阎锡山为主要打击对象，可以避开与东北军、十七路军的正面冲突，为西北联合局面创造良好的环境。毛泽东指出：我们“执行‘抗日联军’的策略，把敌人营垒

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，把我们营垒同‘第三营垒’结合起来，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”。

二、决定东征山西为主攻方向

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，瓦窑堡会议讨论通过的《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》，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。23日，毛泽东代表中央作军事问题的报告。经过反复讨论，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，决定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，并在当天通过了《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》。

毛泽东的报告分三部分：战略方针、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和行动计划。他指出：党的目前战略方针，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，必须在政治上、军事上和实际行动上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。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，猛烈扩大红军，把红一方面军的行动与苏区发展主要方向，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。会后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向红一方面军下达了关于40天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。

1936年1月17日，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，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，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。他指出：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。我们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，扩大抗日的力量及主力红军。2月至7月，我们的行动在山西。由山西到绥远的转机，要看日本对山西、绥远进攻的程度及我们的力量如何而定。我们向南、向西、向西北，文章不好做。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，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，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。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，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。山西的发展，对陕北有极大帮助，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。政治局随军行动，陕北组织中央局。常委会议决定：彭德怀、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；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彭德怀、林育英、何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；周恩来、秦邦宪、邓发组成中央局，周恩来任书记，主持后方工作，王稼祥病愈后可参加会议。

三、东征战役全面展开

1936年2月18日，红一方面军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。2月20日，红一方面军第一、第十五军团在毛泽东、彭德怀的指挥下，从南起河口北至沟口100余里地段同时渡过黄河，开始了东征作战。渡河成功后，阎锡山急调晋军防堵，也把入陕的晋军撤回参加防堵。

2月24日，红一方面军为打破晋军的防堵和建立作战根据地，决定：除留一部兵力围攻石楼外，红军主力迅速占领柳林、离石、中阳、孝义、隰县、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，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；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，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，完成东征计划的第二步任务。

面对我军突然攻势，阎锡山一面请求蒋介石派军队来晋增援，一面把能够机动的军队集中起来，组成四个纵队向我反击。我军主力奋起还击，将敌两个纵队击溃。我河西红二十八军乘入陕晋军东撤之际，进占了宋家川、吴堡等重镇，收复了陕北苏区一部分被占地区。阎军节节败退。3月12日，红一方面军为进一步发展胜利，扩大战果，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，决定分兵南下北上：以红一军团全部及红十五军团一个师为右路军，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，迅速占领临汾、洪洞、曲沃等县，视情况向晋东南行动；以红十五军团两个师为左路军，在掩护红一军团南下后，北上相机占领文水、交城，直逼太原，向晋西北行动；以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，转战隰县、交口、石楼、永和一带，牵制晋西敌军，担任控制渡口、交通等任务。此时，红二十八军已进入神府地区，收复神木、葭（佳）县大部失地后，向黄河沿岸活动，策应东岸红十五军团行动。

当此东征开始之际，3月20日至27日，中共中央分别在晋西大麦郊上贤村、隰县石口、石楼城西四江村等地召开政治局会议，通称“晋西会议”。会上，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山西建立根据地、红二十八军向东调的可能性和正确性，指出向华北发展不会动摇陕北的巩固；有民众的援助和支持，不但要在山西争取对日直接作战，还要准备在河北、山西、绥远三省中进行运动战。在27日的会议上，毛泽东还论述了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，即：（一）不但要把民

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，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，要在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口号下，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，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。（二）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。（三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，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。（四）中央对李克农的外交训令，今天仍然适用。此外，毛泽东还代表中央提出了对张学良的策略。这次会议，是瓦窑堡会议的继续和重要补充，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，确定了红军的行动方针。

3月下旬，阎锡山将已调入山西的5个师编为第五、第六、第七纵队，将其他调入山西的3个师3个旅集结在同蒲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。蒋介石派陈诚担任入晋军队总指挥，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。敌军首先夺取我军控制的黄河渡口，采取堡垒战，企图歼灭我黄河东岸的主力红军。

红军抗日先锋军总部鉴于此种情况，于4月3日决定：逐步收拢兵力，准备集中歼敌。经过转移和激战，实现了我左右两路军集中的计划。4月28日，毛泽东、彭德怀在致周恩来、林聂、徐程、叶杨电中指出：在山西，阎锡山、蒋介石军队共有51个团，采取堡垒主义向我围攻；在陕西，蒋介石强令张学良、杨虎城向陕北进攻，企图封锁黄河；但陕北神府地区、三边地区和甘肃环水地区及其以西均空虚。“根据上述情况，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，而在陕西、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，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，以执行扩大苏区、锻炼红军、培养干部等任务；另一方面，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，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。”“我军决西渡黄河，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。渡河时机、渡河秩序及集结地域之区，分别命令定之。”“向西执行上述任务，仍然是为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，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。”

四、东征战役的重大战略意义

5月2日，红军抗日先锋军总部下达西渡黄河的命令，至5月5日全部渡

完。东征战役是一次战略性的进攻战役。在历时 75 天的作战中，共消灭敌人约 7 个团，俘敌 4000 余人，缴获各种枪 4000 余支，炮 20 余门，迫使晋绥军由陕西撤回山西。红军取得江河作战经验，提高了战斗力，扩大新兵 8000 余人，筹款 30 余万，征集大量物资，并在山西 20 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，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。^①

5 月初，红军西渡黄河后，毛泽东在陕北交口政治局会议上作《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》的报告，在总结东征战役时指出：红军东征动员了全国，军事上、政治上打败了阎锡山，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，推动了各派军阀的反蒋运动。红军执行了政治任务，对山西和全国都有动员作用，说明红军是抗日先锋队，人民的救星，说明红军是有力量的。我们的同志中，长征以后觉得自己小了，山西的胜利，扫除了这种观念。我们打败了阎锡山——西北第二个大军阀，其各部皆受重创与打击，商震也吃了一点亏，攻开了两城，消灭了一些民团和封建基础，扩大了红军，争取了资财，陕北敌人退出，总之是胜利了。他还具体分析了战役的得失，指出山西行动的主要缺点，即未立即出河北。后来蒋以 51 个团来时，再到河北去，则危险了。此时已不能挽救。因此，一着之误，乃失去了在山西创建根据地的可能。隔断归路，是无论如何不许可的。保持后路，是战略上的一个原则。

瓦窑堡会议后，我党我军在红军东征期间，一面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，准备东出同日军直接作战；一面采取实际措施，进一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，这是我们开展新局面的关键。打败日本帝国主义，需要统一战线力量，需要各阶级、各政治派别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力量，同时在党内也要反对关门主义。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，中国革命的力量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，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。

^① 关于东征战役的战绩统计数字，各位亲历者的回忆略有出入。本书为了保持亲历者回忆原貌，未做统一处理。——编者注

但是，如何把抗日和革命力量汇合起来，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战线呢？这是我党我军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的关键。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，进入山西，发动东征战役，既声援了“一二·九”学生爱国运动，又促进了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。在山西 20 多个县的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，号召和动员群众抗日救国。党的正确主张和东征战役的进行，动员了山西民众，也动员了全国民众起来抗日救国。

在东征战役进行的同时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主动发出信件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。这个工作对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到 1936 年上半年，红军与东北军、十七路军之间，实际上停止了敌对行动。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首先取得重大的胜利。

“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”的方针，体现了党的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主张和打击反动势力、争取中间势力、发展革命势力的策略思想。在新的全国大革命即将来临的时候，为扩大红军力量和巩固苏区根据地，准备东出直接对日作战，毛泽东提出应大胆地采用“以发展求巩固”的方针，到外线去打击卖国贼阎锡山，调动他入陕的 4 个旅兵力，避免新的“围剿”，是正确的决策。通过东征战役，可以说达到了打击阎锡山、逼蒋抗日的目的。

（本文选自《党的文献》1996 年第 6 期）

关于红军西征（代前言二）

黄明发

1936年5月起，红军西方野战军所进行的西征战役，是继红军东征山西回师之后，为继续贯彻中共中央所确定的“以发展求巩固”的方针，为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，创造新的陕甘宁边革命根据地，扩大抗日红军的力量，迎接红二、四方面军北上会师，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，所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。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做一些探讨。

一、红军西征的任务是什么？

关于红军西方野战军所担负的战略任务，目前许多论著都说有“三大任务”（有些论著列成“四大任务”），而关于“三大任务”的内容，表述又不尽相同。其实，当时中共中央和军委提出了两个“三大任务”，有两种不同的赋予性质。一种是赋予陕甘地区全党和全军的“三大任务”，即：（一）向西面进攻，以造成广大的陕甘宁边革命根据地，联系着的任务是北通外蒙和苏联，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、六军团的联系；（二）南面争取东北军、西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，联合抗日；（三）东面坚决地进行游击战争，以抗击蒋介石、阎锡山军队的进攻，保卫陕甘老苏区，决不放弃老苏区。关于这个“三大任务”，在5月18日西北军委发布的《西征战役计划》、5月3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发布的《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》和周恩来1936年秋写的《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》（手稿）等文件中的表述都是一致的、清楚的。中共中央还在有关指示中明白指出：这三种任务，是三位一体的联系着的三大任务，其目的是争取时间，争取力量，为将来的大发展准备条件，并迅速实现对日作战。

另一种则是赋予西方野战军的“三大任务”，实际是将上述“三大任务”的第一项具体化为三点，赋予西方野战军去完成。即：（一）向西发展，努力创造和扩大新的陕甘宁边革命根据地；（二）创造条件，迎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、六军团北上，争取早日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；（三）消灭“二马”，占领宁夏，打通外蒙和苏联的联系（当时亦称“打通国际路线”），以便接受苏联的军事物资与技术等援助。这三项任务，在《西征战役计划》《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》以及1936年7月27日以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杨尚昆名义发出的《中革军委为完成野战军的三大任务给各兵团的指示》等文件中，亦是表述得十分清楚的。

红军为什么要西征？这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的。红军东征回师，虽然发表了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》，向南京国民政府倡议：“在全国范围，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，双方互派代表，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。”但是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无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倡议，并不顾日本侵略者造成的深重的民族危机，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国策，总想用武力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。1936年5月，蒋介石即着手组织晋陕绥宁四省边区“剿共”总指挥部，以陈诚为总指挥，调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，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“进剿”。其总的形势是：在陕甘苏区的东北线，部署了蒋介石、阎锡山的部队约六个师，作为“进剿”军的主力；在陕甘苏区的南线，部署了东北军、西北军的八个师，配合向红军进攻；西北线上则以宁夏马鸿逵的第七师和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驻守要地，防堵红军西进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一则红军不能困守陕北，二则红军要抗日，就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的后方根据地，壮大红军的力量，所以必须继续贯彻“以发展求巩固”的方针，坚持向外发展。当时向东发展不可能，陈诚在东线重施其第五次“围剿”的故伎，大筑碉堡，步步推进，红军如硬攻东线，将会造成两败俱伤，徒损抗日国力，且亦不利于根据地和红军的扩大；向南发展也不合适，因为南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是受蒋介石压迫和欺骗来进攻红军的，他们对进攻红军非常动摇，红军可以努力争取他们共同抗日，据4月间周恩来与张学良所秘密举行的“延安谈判”，双方已初步达成“停

止内战，共同抗日”的口头协定；余下只有西向宁夏发展。当时考虑向宁夏发展有几个有利的方面：一是宁夏只有“二马”的两个师，部队不多，兵力薄弱，且由于交通不便，蒋介石不易调军队来援助“二马”。二是宁夏地域广大，人口在200万以上，在西北为最富庶地区，红军可以夹长城发展，扩大根据地，且可解决军粮问题。宁夏虽然回民较多，给地方工作造成复杂性，但陕宁边境汉人亦较多，便于发展。三是占领宁夏，可以北出绥远，接通外蒙和苏联的联系，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，亦接近华北抗日前线。这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军委最初决定红军进行西征的主要根据。

当时中共中央还曾明白规定：赋予陕甘全党全军的“三大任务”，除第一项由西方野战军专门担负外，东线游击战和南线争取东北军、西北军以及吸引蒋军兵力以配合西征等的任务，则由中共中央和军委率领陕南部队第二十八军、渭北部队第二十九军、陕北部队第三十军（上述各部都划归红一方面军建制）等去完成。

现在一些论著中，把第一个“三大任务”笼统地说成也是西征的“三大任务”，而不另提西征的“三大任务”，这是欠妥的。根据当时中央文件的明确规定，应该分开来说明，这才符合历史的原貌。

二、关于西征的起止时间

如果上述关于红军西征的“三大任务”是无误的话，那么关于西征的起止时间问题，在认识上也是应该容易统一的。

关于西征的开始时间，许多论著说法比较一致。一般认为：1936年5月16日，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，总结东征，动员西征。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和任务的报告，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讲了话。18日于大相寺，中央军委（当时称西北军委）以主席毛泽东，副主席周恩来、彭德怀的名义，发布了《西征战役计划》，即“行动命令”。军委决定：以红一方面军之第一、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、骑兵团等共13000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，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，进行西征宁夏的战役。5月20

日前后，西方野战军兵分两路，红一军团为左路军，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，相继从延长、延川地区开始出发西征。第八十一师、骑兵团和野战军直属队随右路军后跟进。

关于西征的结束时间，目前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。一种意见认为，是1936年7月底结束，即重创“二马”，开辟了陕甘宁边革命新根据地，时间为两个多月；另一种意见认为，是1936年10月下旬结束，即于三大主力红军会合之后，时间约五个月；还有一种意见认为，是1936年11月下旬结束，即三大主力红军会合打完了山城堡战斗之后，时间约六个月。

我们认为，从西方野战军所担负的三大任务完成情况来说，西征战役应以1936年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实现胜利会师为结束的标志。因为到8月间，西征红军即已重创“二马”，占领了陕甘宁边十几座重要县城，开辟了纵横约八九百里的苏区，基本上完成了创造陕甘宁边革命新根据地的任务。10月9日，红一方面军第一师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城胜利会合；10月22日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与红二方面军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胜利会合。至此，西征军迎接红二、四方面军北上，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任务也已完成。至于夺取宁夏、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，则由于8月间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，决定了新的政策，计划尽早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，然后集中三个方面军，共同去夺取宁夏，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，形成抗日局面。所以从8月间起，关于夺取宁夏、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已经不是西方野战军的任务了，中共中央已将这一任务赋予了会合后的三个方面军共同去完成。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。至于山城堡战斗，那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，三个方面军协同进行的战斗，已经不属于西征任务的范围。应当说，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进行会合后，中共中央赋予西方野战军的西征战略任务也就光荣地完成了。

三、夺取宁夏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没有实现的原因

夺取宁夏，打通国际路线，以便接受苏联的军事技术援助，这是中共中央